

再生

日九十二月二年七卅 刊 週 期四〇二第

號七〇七第照執理管政郵東川

類紙聞新類一第為認記登政郵華中

號四九五二第字警證記登誌雜部政內

社 言

司徒大使語重心長

論「匪」與「剿匪」

什麼是中間路線

論利用外資

論廢「經」與「尊孔」

東北之沉疴——中醫乎？西醫乎？

政治澄清工作的微妙

中國歷史上之財務行政

·路

·梁

·沈

·黃

·夢

·雲

·杜

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ANKING CHINA

行發社版出生再

(元千八價售期本)

號一十三弄九四七路園愚海上

(版出日期星逢)

社 司徒大使語重心長

本月二十日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發表致中國人民書，全文見於各報。文字並不如一般文告之冗長空洞，其難得為語語真摯，字字有來歷而具有深衷，綜觀近日外人批評我國現局的篇章，有分量，有情誼，如此文者，尙是初觀，我們以為語重心長四字，惟司徒大使足以當之。

自前年到今年，我們看到三篇比較綜合性的評言，出自美國官方友人，第一篇是馬歇爾的，第二篇是魏德邁的，第三篇是司徒雷登的。馬歇爾偏重於中國和譚之消失，對雙方都有抨擊，字裏行間，爲自己壽命卹言；魏德邁以上他國特使之尊，臨去備致訓飭，疾惡過甚，悻於中國古君子之道，囑囑中國人，是一片決絕自立的聲，並未收預期之效。司徒此文不同之點第一是他對中國現局認識清晰，任何外人，不能與瞻。他生長中國，接觸廣闊，中國人之歷史，思想，生活，和近數十年來的政治社會的動盪，他固都熟悉無遺，將任大使之時，已成爲美國友助中國的一個主力，既任大使以後，適值中國最艱難危疑之秋，調處國共，輻和中美，無不煞費苦心，近日局面日非，各方期待援，焦灼之餘，不免對司徒屬目更甚，他此時不得不打破近一向的沈默，把最近美國對華政策及所引起之問題，予以解釋。此文用心推誠，莫不有物，例如說：「根據中國歷史的教訓，羣衆呼籲追隨他們所信任而有品德的賢明領袖。如果以中國原有方式作現代憲治的程序，那麼不斷以開明的輿論監督政府，防止官吏貪污之變本加厲，無黨難逐漸消除……」本人和中國學生相處很久，所以深知中國原有的愛國的理想：「人民宜不斷以開明的輿論監督政府，防止官吏貪污之變本加厲，無黨因此，即須有言論出版的自由，及自由探訪或公正報導新聞的自由。」這些針對現實的話，都是呼之欲出。中國近年來官吏貪污之變本加厲，無黨派的青年運動的遭受限制，自由輿論和忠實報章的橫被壓迫，司徒大使耳聞目見；文告中乃慨乎言之。第二此文決非消極的批評，而是積極的督促，因爲司徒不但對中國現局，窺視其隱，他仍是熱愛中國，尤其同情中國被壓迫的人民。中國目下政治的貪污與無能，已爲觀者所痛，仇者所快，一般對於中國政府和人民的訕笑毀謗，老友如司徒者聞之是不能不痛心的。一個專替駐在國說好話的使節，恆常爲本國當局所不喜，司徒處於理與情，事與人的矛盾中，若閱可知。近半年來美國三黨對華親疏不一，中國國內，黨同伐異。各有千秋，司徒大使和中國當局的熟面孔特別多，所以說話更難，他不是職業外交家出身，不會也不願說那些風花雪月的漂亮話；他是中國人民的舊雨，也不能機械的做美國政府的傳聲筒；此番他未以原稿就正於美國國務部而逕自發表，其果敢熱情，我們覺得特別值得欽愛。

外交慣例的推測以爲司徒大使要更動了，這些話不是臨別他不會說的。這個推測之錯誤，正如同說他所在強國國共復開和議一樣。司徒的燕京大學校長是終身無法擺脫的，他可能永遠不會離開中國，希望猶及見中國之承平。以司徒之單純率直，我們相信他以大使的身分如此告中國人民，他以中國老友的身分，必也是如此告中國友人。

試問司徒大使的文告有什麼反響與效果呢？文中所說的「極端反動自私份子」和「極端激烈份子」會說他「很多地方不明瞭中國情形」或「總帶着些偏見」嗎？我們相信他們對司徒不會如此說的。不過所謂反動份子和激烈份子自己已在從未承認他們是反動和激烈。他們居之不疑，行若素，什麼民主，法治，到他們手裏，便成了一條繩鞭，以威嚇異己。試看一黨專政的制度，早爲全國人民所鄙棄，且爲行憲以後所廢除，但目下那一件事仍不是由一黨獨裁着？司徒所說「本法治精神，不隨個人好惡，循憲政程序而將其實際運用。」今日施政趨向是否如此？我們要等待這兩種份子的洗心革面，無異俟黃河之清。若從進真民主之早日實現，惟有人民自己起來，如司徒所說的「今天中國面臨的危險，必須由所有大公無私的公民共同努力，方才可以克服。」我們不能再容忍國家的政治僅爲少數人的安富尊榮作保障，而置廣大民衆的呻吟痛苦於不顧。

司徒大使文告並不想立異以鳴高，所以我們認爲也正是一般有知識的中國人要說的話。而其與馬歇爾魏德邁所指責我們的缺陷，並無二致，獨怪我們聽了友人的評言，無論其爲盛氣的或溫和的，以致動僅爲一時，似乎有些人覺得外人「不該越俎」但絕少有選善之決心，知恥之勇氣，自上至下，並未見有顯著的改善，貪污依然，無能依然，以致國際聲譽日墜，人民憤懣愈增，我們政府在期求貸款之成功，而美國輿論則以貪污與無能爲口實，以一個不能見信於人的劣勢求援，無怪其一波三折，何況貸款祇是救急，並不能解決基本問題，若人民沒有聯合澈底革新力量，即使貸款到手，「政治安定」和「經濟復興」也仍是一個遠景。我們相信若不是司徒大使所說的「中國忠於自由的愛國份子」都奮然而起，團結起來，這空前的危機祇一天一天臨近，而司徒大使恐亦唯有一牽馬就槽，不能強馬飲水」之嘆了。

論「匪」與「剿匪」

· 路 · 人 ·

自從歷史上又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戰亂建國的重大責任付與國民黨（國民黨四中全會宣言）以後，國民黨亦自知「目前革命環境的困難」，覺得黨的力量，不足以勝任而愉快，于是下了總動員令，將這個「重大責任」又分担到人民的頭上來，要全國同胞，本着「共同的國家觀念，民族意識，一齊提攜，以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統一與完整」。

本來，一個國家的領土主權，如果不甘做別國的附庸，當然天經地義的要做到統一與完整，不容許有絲毫的殘缺。但不幸而已經殘缺，必得先求其所以殘缺之故，認識病原之所在，而後對症下藥，力求彌補，才能克奏膚功，日臻全愈。假如看錯了病原，而亂投藥石，勢必至于弄得病人膏肓，無可救治。既未能防範于未然，又不善診療于事後，一誤再誤，真不知到了怎樣一個結局！

我中國領土主權之不完整與統一，是盡人皆知的事實，而且正在走向更不完整與統一的道路，大有江河日下之勢。內戰毫無止境的打下去，國計民生，日趨凋敝；日本帝國主義的狂妄叫囂，以及對琉球台灣的覬覦，寢寢欲恢復其侵略的野心；大連旅順之迄今無法接受；都說明我國症狀的岌岌可危。醫國手的大人先生們，都一口咬定，病根是由于共產黨的叛亂。他們不暇也不敢更進一步去探求為什麼共產黨會如此滋長壯大？而且為什麼會繼續叛亂不已？他們認為祇要將共產黨全部消滅，則國家的領土主權，馬上就可以統一與完整。于是舍棄了合作之路，關閉了和談之門，而採取了總動員「討共」「剿匪」之絕對主張。把所謂「戰亂建國」的「重大責任」，拉到自己肩上來，前次四中全會決定的政治綱領，第一條就是「剷除共匪」，國府致魏特遇之文件中，第一個應付危機之政重就是：「共產黨武力，必須使之消滅。……政府決不願考慮任何不澈底之辦法

。」到處都表明其破釜沉舟孤注一擲的決心，至於成敗利鈍，死活存亡，國脈民命，一切在所不顧。

我們姑不論醫國手的大人先生們將病原看錯了與否，即使承認其不錯，也必須依照所看到的症狀，而投一點有效之藥。譬如一個病人，正在發大寒，僵臥瑟縮，戰抖不已，即使你不去研究發大寒的原因而竟取治本之道，僅僅認為這個病完全是大寒在作祟，亦必給病人多喝些生薑紅糖茶，多蓋上幾條棉被，以盡治標之能事。這樣，不管這個病能否全愈，但至少可使病人多得到一點溫暖，稍祛寒氣。假如再給他吃一杯冰淇淋，蓋上一條薄薄的被褥，把他安放在一間冷濕而陰森的屋裏，則欲益反損，必然會得到相反的結果。目前政府既認為破壞國家領土主權之統一與完整，是由於「共匪」的叛亂，而加以征剿。那末，用以「剿匪」的部隊，總要比「匪軍」來得嚴整精銳，藉以「剿匪」的政治，總要比「匪區」來得賢明正大，才能使人心攸歸，「匪」勢稍殺。然而事實並不如此，誠如軍紀吏治督察團於十二日上午正式發表其為改善軍紀吏治向中央之建議書中所言：「目前軍紀不良之主要現象為：（一）濫徵給養工料。（二）強佔強購。（三）空額太多。（四）戰鬥情緒低落。（五）不能愛護人民，扶植地方武力。（六）濫用軍權，干涉行政。吏治不良之主要現象為：（一）官吏貪污，由公私不分，假公濟私，以致以私害公，不一而足。（二）機關濫收濫支，偽造報銷，營利，分肥，空額補虧。（三）事權不一，責任不明，遇事互相推諉，牽掣。（四）法令繁雜，解釋紛歧，奸滑之吏，上下其手，營私舞弊。（五）一般公務員工作情緒低落，服務精神太差，致影響行政效率。嗚呼够了，以這樣的軍隊政治，而欲完成「歷史上所賦予的戰亂建國的重大責任」，不亦憂憂乎其難哉！雖然政府的決心，值得敬佩

；雖然官方的報紙雜誌以及宣傳當中，怒目眦眦，大罵「奸匪」；但自老百姓的眼中看來，「匪」與「剿匪」者，着實沒有什麼分別，甚或「剿匪」者的作風，比「匪」還要來得窮兇極惡。老百姓已經失去了判明究竟誰為「匪」的智慧了。

按照中國往古的慣例，所謂「匪」，一向是沒有正確的定義的；大抵「成則爲王，敗則爲寇」，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是也。當一羣英雄爭奪天下的時候，誰不被目爲亂臣賊子，而且消滅異己，南面稱王，則無論其所作所爲如何，立刻有許多御用學者，幫閒文士，出來「騎賊依哉」的歌功頌德，稱之爲「聖天子」，「大明君」。而又將在他統治之下所有表示不滿反對或犯上作亂的人，一概視爲大逆不道的匪徒，坐以重罪，處以極刑。翻開中國的歷史，幾乎每一個朝代，都是串演的這一幕醜劇。錦繡河山，不過是英雄們逐鹿的場所；而千百萬生靈，也祇輪番的成爲英雄們的俎上魚肉！誰是誰非，千秋萬歲之後，都還有定論，這是一。其次，在「剿匪」這一點上，赫赫王師，往往比烏合之衆的「匪」，更其兇惡殘忍，更其爲害於人民。漢代「赤眉」「銅馬」之亂，爲害不爲不大，然而民間却流傳着「甯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猶可，更始殺我」的民謠。（太師和更始都是當時劉赤眉的領袖，明末李自成號爲「流寇」，到處滋擾，爲害亦不爲不大，然而老百姓怕「流寇」的程度，遠不及怕「流寇」之深；因爲「流寇」不過是一路過，所「流」到的地方，才受到他們的剝掠，而「流寇」却等於「坐寇」，天天在老百姓頭上踐踏掉取。所以當時也流傳着「賊來如梳，兵來如篋，官來如剝」的俗諺。雖然正統的歷史家們，用春秋的筆法，在他們頭上冠以或匪或寇或盜或賊的帽子，這並不能說明他們就真的是匪寇盜賊，祇說明了他們的事業，沒有能成就，有的竟被統治者消滅，有的被另一個新的統治者所利用而已。因之一般小說家對歷史的看法，得出了「治久必亂，亂久必治」，或「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邏輯。

二十世紀民主浪潮洶湧澎湃的今日，八年艱苦抗戰徵倭勝利的中國，又出現了空前未有的大戰亂。共產黨擁有二百萬大軍，公然舉起革命的大旗，和政府對抗。這一支新興的革命力量，無論從那一方面看，都不能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呼之爲「匪」。固然不能和漢代的「赤眉」「銅馬」相提

並論，也更不能與明末的「流寇」同日而語。事實顯然，中外皆知。但不幸政府諸公，都患了短視病成不敢正視這一事實，祇知意氣用事，認爲共產黨既不服從「政令」「軍令」，即係「叛逆」「奸匪」，把他們和「赤眉」「銅馬」流寇等，一視同仁，下令「討伐」，出兵「征剿」；更不幸在征剿者的陣營裏，竟出現了無數類似漢代的「太師」「更始」，和明末的「流寇」。

筆者渺然小民，國家大事，本不敢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但一點憂國憂民之心，却未敢讓入。年來耳目所親，愈弄愈覺不成體統，無法無天，荒唐絕倫之事，到處都有。趁此政府大喊革新之際，謹舉其孽障大者，公諸於世，冀幸「君心之一悟，俗之一改」，聊盡我黍爲國民之一份誠實。共產黨爲了戰爭的需要，大舉破壞，曾給人民以很大的苦難與不滿，而現在我們的國軍，也跟在他們後面學步了，先是拆毀民房，建築碉堡，繼則將逼緊據點的房屋，一律拆光，以便「監視奸匪活動」，掃蕩的時候，也會縱火焚燒村坊，說是洗滌匪窟。共產黨將戰勝繳獲的武器，組織民兵，從未向老百姓收一文槍械捐；而國軍所組織的自衛隊，這一筆槍械捐，就大得驚人。而且共軍對民兵的幫助，不遺餘力，國軍對自衛隊，祇有叫他們去送死的份兒。有一次在一個小據點裏，省保安隊和自衛隊分住兩下，共軍單去攻打自衛隊，保安隊熟視無睹，一槍不發，結果自衛隊全部被俘，而保安隊却向共軍大呼：「我們大家都是混世的，無須認真」。第二天一早，也就自動撤退了。共產黨因爲上面沒有供養，祇能就地徵收公糧，此外並無其他請求；而我們的國軍，對於徵收公糧，固不肯讓共軍獨佔其美，而又依照「民國萬稅」的習慣，巧立名目，百般搜括。共產黨雖在其「鬥爭」「清算」的政令下，對地主打擊強烈，但對一班窮百姓，尙無甚侵擾；而我們的國軍，不管你張王李趙，只要你他們合適的東西，諸如酒肉鴉片羊衣物等，他們都可以探囊而取。有一次，下鄉的「掃蕩」，「掃」到一個自衛隊的家裏，其家屬馬上分訴道：「先生！我家的男人，也在你們裏面帶忙的呀。」國軍却怒目厲斥：「媽的×，什麼東西！你們家裏的東西，不也是搶得來的嗎？」共產黨的幹部，無論大小，都能與士卒同甘苦，共生死；而國軍裏面，軍事人員自營連長以上，行政人員自鄉保長以上，幾無不花天酒地，苟安享樂。去年夏天，蘇北的國軍，

在如黃公路上和共產黨展開了遭遇戰，四面的槍聲，已經密起來了，而長官們却在老百姓裏找鴉子，又麻將，結果當然以收贖聞。共產黨曾在國軍優勢的壓力下，被弄得七零八落，但還是越打越堅強，越有勁；而國軍却是虎頭蛇尾，日漸消沉。最近三數月來，我的家鄉蘇北的國軍，完全處於被動地位，只有招架之功，很少掃蕩的舉動了，甚至有些小據點，被共產黨幾顆流彈，幾回辱罵，就嚇得連夜撤走。無怪乎「匪」勢猖獗，不堪收拾了。在這樣強烈的對比之下，怎能怪老百姓撲朔迷離，黑白難分！

當共產黨以強烈恐怖的手段，執行所謂「鬥爭」「清算」政策的時候，關得烏煙瘴氣，人人自危，當時「解放區」一部分甚或大部分人士，都

什麼是中間路線

在這二十世紀的年代，整個世界起了劇烈的變動，西方國家，由帝皇專制，轉變到資本主義社會，在第一次歐戰末，俄國產生了共產主義社會，此後世界政治，便分成兩個類型，一是以英美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社會，一是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社會。若給以一個簡單的代名詞，前者稱為右傾，後者稱為左傾，右傾與左傾，走的方向不同，路線不同。性質不同，手段不同，便發生矛盾，對立，不可調協，甚至是在不能併存於世界的形勢，猶之兩個物體，不能同時併存於一空間一樣，具有深厚的擴張欲與排他性的。

由於現實的情勢，如此複雜紛爭，確的是具有高超理想及遠見的，愛好和平的人們所駭怕與痛心疾首。第一次大戰後納爾遜總統，曾為實現此理想，盡了很大的力量，而斡旋和平，但終至失敗有第二次的大屠殺。此次大戰後，人類心目

不免對國軍寄以極大的希望；但而今這一點希望，已經漸漸縮小到近於絕望了。「以暴易暴」，「以匪亂匪」，替人民加深了一層苦難，靜而思之，伊誰之過與！

「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已成了目下老百姓普遍的怨聲詛咒，可悲也夫！

假如醫國手的大人先生們，還不反省檢討，另立良方，硬要固執一己之偏見，單用本國貨的砒霜，和外國貨強心針，恐怕不但於病人無補，而且還要加速死亡。草野小民，情急辭激，幸大人先生們注意及之。

· 梁宗輔 ·

中對戰爭極為厭倦與駭怕，要求世界永久和平的心理，油然而生。然而熱心之士（如故羅斯福總統），曾為和平呼籲奔走，但經過過去之考驗，人們對和平之信念已貶價，雙方已看清楚，各有懷抱，各具野心，和平已達不可挽救之境地，如果理想天真，只是自取煩惱。在此失望之餘，便有中間路線的產生，中間路線，比較中和的路線，是在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路走不通，而且日趨惡劣的情境底下，才產生出來，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這種作風，已瀕於極端危險的時候，如更不主覺，危崖勒馬，必會冒出一部文化史推倒，互相撕殺，殘酷、慘痛、悲苦的氣氛，滿布了整個地球。人類的心理充滿了私慾攘奪，貪婪的念頭，更出之野蠻的暴行。科學家積年累月，苦心焦思，發明的東西，落在貪慾者的魔手裏，不用作

改造人類的幸福，相反的，用作摧殘人類的生命，原子能的發明，不用作機械的原動力，增加生產，而偏製造屠殺人羣的原子彈。假使尼采還生存的話，看見此惡濁的世界，更會「痛不欲生」。哲學上的悲觀論調，更會強調濃厚與有力。因此，文化進步，科學發明，不一定是人類的幸福，不一定得到文明進化的結論，相反的會產生愈趨野蠻底惡果。在消極方面便有人主張回復到自然去。積極方面便要對政治，重新考慮，估計評價，左右兩極端走不通的路線，不能再讓他走，必須覓取一條新路線，兩極端之間的中間路線。

出發點錯誤，所走的路線，亦必錯誤，理化室裏實驗的方法錯誤，所得的結果，亦必錯誤。政治路線走錯了路，必須從出發點，找出錯誤，從根本上更改，確立新的宗旨，方針。重走新的

路，英國工黨登台後，也覺悟到資本主義走錯了路，把關係於民生之最大企業（如煤礦交通等），歸國家經營，此種政策的推行，近似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改良主義，這是暫時性的，無一定永遠的方針與策略，甲黨登台如此，乙黨登台，不一定如此，丙丁登台，更不會如此。它的作風縱有漸接近中間路線與緩和極端的傾向，可是沒有固定的政綱與策略，很易動搖與幻變，其之只曇花一現而已。固定的政治路線，便與此不同，不會因人事變動而至影響政綱，如列甫死後，有史太林承繼，即使史太林死後，也許還有第二個史太林去承繼。所以暫時性的策略，與永久的政治路線，却有所不同。

時代是向前走的，政治理論與行為，後來者應比前者進步，總無絕對的可言，但也許有相對的真理，有新的路產生，也必須於舊的路不通了，往後才有此念頭。中間路線，便是在此意義情境底下產生出來的。此便是中間路線的時代背景。中間路線，它的形成却處於中間形態。它的內容是盡量吸收左傾右傾的長處，揚棄左傾右傾的短處。它反對階級鬥爭，不人道的殘殺，攘奪。無產階級專政，造成大部分人民操政權，少數人被壓迫，此是報復式的姿態，因循相循，血賬永世清算不了的。它也反對資產階級操縱政治，造成少數人的享樂，多數人痛苦的壟斷政治。它反對一黨專政的寡頭政治，一階級專政的獨裁政府。而主張多黨的，各階層綜合的全民政治。全民政治的產生，才能使各階層利益相調和，不以少數欺壓多數，或以多數欺壓少數。資本主義社會，擁護上層分子利益，漠視中下層之應得享受

。共產主義社會維護下層分子之利益，對上層用暴力的推殘，殺戮，置於不能生存的境地。此種作風是中間路線所不取的。中間路線是把握中層，爭取上層，擺放下層，各層之利益互相調協退讓，而謀合理的解決。

中間路線認為以武力不能解決社會問題，武力只是作治標式的，求暫時的壓服，不能作根本的解決。只有用適當的政治手腕，才能作合理的根治。武力只可使社會癱爛，文化倒退。曾有時在政治設法解決時，不得不不用武力，可是武力始終不是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馬克斯認矛盾鬥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这只是看到社會由病態到正常過程中的發展現象，矛盾鬥爭，是一種不合理的解決社會問題的手段，社會正常的發展，是須在和平的安穩的狀態底下，一步一步地向前。

一套好的政治理論，不在標奇立異，是很平常的常見的，人人腦裏所想像得到的。這樣的理論，才受大眾歡迎，適合大多數人的要求，政治是與眾人密切相關的事，所走的路線，為眾人所接受的，便是真理，便能推行無阻。如亞士匹合消治龍等藥，流行之廣，便因為能治多種普通流行的病，適合大眾要求的緣故。

中間路線的政治理論是很平凡，作風很和平，適合於「中庸之道」，所謂「中庸」就是反對極端，過與不及，皆非中庸，過與不及，無論人情物理，皆非普遍現象，是特殊的，偏僻的，怪異的，非大多數人所愛好，只為適合少數人癖性，從此發展下去，必達最後崩潰，不可收拾的程度。如邱吉爾下台後，英國府治的政策還可平穩

地繼續下去，羅斯福死後，美國政治還無何變動，杜魯門肩起繼往開來的責任。但是大獨裁者，希特拉與莫索里尼之流，即使能盡終天年，決不易覓尋如此典型之專權蠻橫，叱咤風雲的人物，為其承繼者。英美民主政治之所以比德意獨裁政治穩定上執行，這便是一中庸一極端之分別。

一切世情物理，總有維持均衡中和的傾向，一端失去平衡，便向他端起來維持均衡，絕不讓只一端極度的發展，地殼失去均衡，地層便起昇降以維持其均衡，一種作用的力，便有反作用的力起來以維持其均衡，一極端之興起，便使他極端與之對立。俄國沙皇時代專制極權，地主蠻橫壓迫農奴之極端，便有共產革命之極端，而與對立。達爾文進化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之理論，便有克魯泡特金互助論與之對立。自然科學家好用絕對性之定理原則，便有愛因斯坦之相對論與之對立。法西斯蒂之極權與蠻橫，便有反極權反蠻野之民主政治與之對立。結果都是過分極權者失利。此種極端之發生（指法西斯與沙皇專制）是社會的一種病態，有其他極端起而對立，便是此病態達最高峯。社會文化發展，須在均衡調和狀態底下的發展，才是正常的。失去均衡調和的發展，是一種病態，如地殼失均衡，發生斷層地震。洪水流盡失均衡，發生水災，一座大廈，棟樑的力失均衡，便要傾倒。世界政治勢力失均衡，便發生大戰。一國之內各階層之利益失均衡，便爆發革命，一工廠內勞資所得失均衡，便發生罷工運動。此所謂失均衡，便是離中庸之道而遠之的結果。

事實上中庸之道，古今中外，是一貫的，不

謀而合的。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倡中庸之道。中國之孔子亦倡中庸之說。直至今世人遂引用作衡量道德行為之標準。就一切事物現象論，中庸者占最大多數，如測量人之高矮，以中等者最多，特高特矮者極少。智力測驗的結果，普通智力者最多，大智大愚者極少。審美之標準，雖有各民族之不同。但特別美麗之作品，亦

論利用外資

共同認為美滿的。味覺之愛好，雖因習慣之不同而異。但調味最佳之珍品，亦一致認為可口的。人類一切的生活傾向，皆有共通之點，此共通即為普遍的，中庸的，至於特殊的怪異的，便不是共通，是各具的特點。各具特點的，不會占大多數。

中間路線，自有其一套政治理論，自有其獨

特的見解與立場，並不是兩面人，編輯或騎牆派。有人說思想只有兩條路，不是左傾，便是右傾，這是不合邏輯的獨斷。天下的路多得很，為什麼只有左右兩條呢？

中間路線是迎合大多數人的要求，把這理想實現，對於消滅戰爭與保持永久和平，才不至落空。

·沈新民·

近來對於利用外資的呼聲逐漸地更高揚起來了，並且已有了若干具體的計劃在進行着。不問其目的在於積極的改善民生或是消極補償破壞，這總是一有關國家經濟的重大課題，頗有商討的必要，尤其是像當前的這一種環境和條件。

資本是生產建設的諸因素之一，而且是最主要，最前提，最有決定性的。一切的生產建設不但離不了資本，就是這一生產建設的程度和成績，亦每每視其資本的供應與運用的多少，始相應地表現出來。從落後而抵達先進，從破壞而恢復新生，其速度與有無可能，以及有何種限量的發展，都由資本的數量及性質來測定。

但我國都是一先天地缺乏着資本的國家。爲了還沒有開始或沒有完成產業革命，我國的資本形態是非常原始的，既不便於蓄積，又蓄積不了多少。此外，因為經濟結構的畸形發展，我國的一些原始資本也都萎縮了，或是變了質，官僚買辦資本，華僑資本大都逃避着，合作資本從未發

育，農業資本向來就非常貧瘠，商業資本不是轉而爲高利貸資本，便成了投機資本，真正能運用在生產建設如工業交通運輸業開發等正當出路的民族資本，實在可憐得很，還有國家資本，也是講不上的。再則，十年來的戰亂，亦使得各地的物質和設備浪費殆盡，活生生地被破壞，這結果，在目前要恢復原都困難，何能再作進一步的理想。所以，唯一可想的出路，便只有借助於外資了。

利用外資的條件是必須有一外國正在資本影響着，否則便得用另一種手段去吸收；但這在當前是較次要的問題。問題是在利用外資的方式，還是通過借款的手續呢，還是讓外國直接投資？華南的有些在實施中的建設是採取後一方式的；至於美援的可能結果，就是前一方式的了。

普通講來，借款方式是利於本國的，投資方式是利於外國的，因爲這樣，雙方對於資本的運用都有了主權，可以自由地取捨。在借款方式下

，本國政府除了對外國政府或出資人出資法人負有一定的債務關係外，別無什麼義務，差不多有充分的自由權，可以運用這一筆資本，在它自己所選擇的路途上；在投資方式下，外國的出資者仍保留着這一筆資本的運用權，它可以收回、移轉或其他，只要它願意。然而問題並不如此簡單。

◆首先論借款方式。

第一是借款的本身條件：利率、期限、數目等等。向外國借款和讓外國投資的不同，本質上言，借款是一種債務關係，除了安全、担保、和償還外，更有一種屬於債務性質的責任，如利息的增付等，與讓外國投資而能必然地取得一些稅類的收入，自有相異之處。借款的數目是有限的，祇少這不能決定於自身的需要，而得看他人的供給及力量，那麼借款的能否滿足需要便是一並不祇屬於技術的問題。從借款的數目，又關連到借款的利率，低利率不能吸收多少借款，而高利

率就得影響到償還的能力和利益，甚至於反而成爲財政上累贅。還有，借款的期間亦是須考慮的，太長和太短都有弊端，但是怎樣的期間亦是不長不短呢？要能使一筆借款恰能運用得盡致，那是件非凡艱辛的事，條件不合理的借款將會無利，或是有害。

第二是借款的附加條件。純是經濟性、財政性、商業性的友誼借款是不大多見的，往往在借款的本身條件外還附有各種政治的、外交的、主權的、金融的等等條件，這樣有時超過了一定的範圍，將使得借款的效用轉變，或得不償失。在外國言，爲了保證，爲了貫徹另一項目的，對於借款的恩惠上，常須要加以某種干涉。這結果，每每礙到一國的主權行使以及其他各方面的不利，並且往往是延延性的。怎樣能令這一種借款不牽涉到別的讓步和服從，怎樣令這一種借款正能有利於借款國，實在是需要考慮再三的。

第三是借款的運用和保證方面。借款的目標如果是爲了生產建設，可是有時候，還竟僅成了借款時的藉口和理由，在借款之後，其用途便又兩樣了，民國以來的好多借款都是如此地被挪用被浪費掉的，無從達到本來預期的收穫。然而這又是一把麻煩和缺乏把握的事，必須在民主政治的監督管理下，始能無意外。這問題關連到好多方面：最先是怎樣能使國家的借款仍是國家的，不變爲官僚的、私人的、和私囊的；其次是怎樣能使得經濟的借款只供生產建設之用，而不再被移爲軍事的、財政的、或政治的；最後是就是用在生產建設上，是否能好地理地運用。否則，借款的債還成了人民累積的負擔，一層又一層地

，令人最終於被壓得透不過氣。

◆ 接着論投資方式。

第一是投資的性質與範圍。讓外國投資，對於本國是不自由的，既不能決定於自己的意志，甚至於還不能確定外國的投資者願投資與否，於是就先得使本國的環境具有吸引力，使投資者可以安全而有益。至於投資的方法亦各有不同，可以自由地無限制地聽從外國投資，可以加以適當的必要的干涉；可以由外國的投資者單獨投資，亦可以兩國合作。但在任何方法下，都有害有利。有一些不需要外國投資的事業，也有一些願意他人投資，但是他人不願意投資的。這類問題，都必須在法律上和條約協定上規定得詳細而合理；否則，這投資對於本國的影響常常不是正，而是負。

第二是投資的外國經濟勢力與本國產業之關係。除非是只允許外國在若干有限度的小範圍裏投資，不然便是相當廣寬的開放。往往，外國投資因其數量的濃厚，人事的科學化，技術的進步，在在與本國的實業比較，都佔着壓倒的優勢。那麼，就該考慮到，在這種情形下，會妨礙到本國產業的正常發展否，以及若是有此一傾向時，如何去校正。假定不如此，那結果必然地只使得民族資本更形枯竭，更經不記摧殘，而整個國家只是外國資本的市場，外國的殖民地，引狼入室，不問開發了我國固有的資源否，但得到好處的，無疑地不是我國，祇是外國。

第三是投資的管理。這似乎是一技術問題，

可是如不能應付得妥善，其流弊亦不堪設想。投資的管理，狹義言，是本國政府對外國資本者的一種法令態度。我國而今有不少法令，如公司法銀行法等都已經爲了適應到外國的投資人而改訂過了，不問合乎他們的意思否，如果我國更要接受外國的投資，就得更有一番手續。像對於外國投資的利潤處理、期限規定、地點和地位、及其他種種，都是應予以詳密地斟酌的。

比較起來，直接由外國投資或通過借款的方式而自行支配其用途，二者各有利弊。投資比較被動些，借款則主動得多；投資比較省力些，借款則繁複得多。但也因此，投資的弊害常更甚於借款。而決定於這條件的最大力量，還是一政治的問題，看中國還能充分地表現爲獨立國，中國的人民還能充分地地在政治上起作用否。

最近一時，看到美援的接洽與安定地帶的在計劃建設了，不得不想起上述的這一課案。中國是必須被建設起來的，中國的生產機構是必須被發展的，可是中國又是一缺乏原始資本積累的國家，除了有另外些可能的但又渺茫的來源外，祇能在利用外資上設法。不問爲着遠大的將來抑爲近日的現實，利用外資都是遲早需考慮到的事。然而，假定不能仔細地把這一問題的每一角落都遇到地計劃過，其結果亦未必能如何有助於生產建設和國民經濟。本文只是最膚淺地述到這一問題的輪廓而已。

論廢「經」與尊「孔」

· 黃河清 ·

一、何謂「經」？

「經」名之置義既廣，應用亦繁，匪特孔學之稱經也。依通常而言，經與緯對。為組織上之要素。祇以含義較深故古來學人宗崇一說，遂至視為常典，而經名之用於某學說，因之以起。後漢班固白虎通德訓云：「經，常也」。劉熙釋名云：「經，徑也，如蹊徑無所不通也」。許慎說文則云：「經，織也」。梁劉勰文心雕龍亦稱：「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他如爾雅，經傳釋詞無不異口同聲，以其具有亘古不變，永世長存之價值，以古至理名論載之簡策，為後世之典範，故名曰：「經」。中庸曰：「以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清儒章學誠曰：「夫六經者，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宇宙之跡，而非託之空言」。惟其如此，古代哲人各有信徒，即可各稱其學說為經。儒家之傳世最長，六經至於十三經，冠用亦廣。儒家而外，如道家之老子所著稱「道德經」，莊子之所著稱「南華經」，列子之所著稱「沖虛真經」，墨家之墨翟所著有「經上，經下」，佛家釋迦之所著稱為「佛經」；墨罕默德之所著曰：「可蘭經」，耶教耶穌所著稱曰：「聖經」，等而下之，後世之引用迭出。猶如茶經，琴經，棋經，不一而足。道之所重，尊而名之。此經匪所以專用於一家言，非孔門典籍庶可以名也。

雖然，後世之所謂「宗經」也，蓋非老莊墨翟釋迦墨罕耶穌之經，乃孔子之「儒經」也（始如是稱）。西漢承秦火之後，罷黜百家定儒於一尊，以孔學道貫古今，為萬世師表，故凡儒家正統之典籍統名曰「經」。隋唐而後與史子集之外，獨成一部合為四庫。由重儒道而經之勢力遂視為安身立命，思想行為，社會國家之繩墨。學宮讀經，取士以經，入仕用經，故兩千年來，經之為用，實有逾於法律。儒林士苑，不求孔子思想之隨時發展，泥守經文以為教條。故經學之弊，乃非孔子所料及。宗

經者亦非真貫通孔學者所能同日而語者也。

二、「經學」與其糾紛

所謂「經學」蓋指研究儒家典籍之專著而言。儒術之可稱者，漢以前大抵分為六類以容納之。故「詩，書，禮，易，樂，春秋」舉為六經。（見莊子天運篇），禮記，漢書藝文志，史記之孔子世家，伯夷列傳，滑稽列傳，儒林傳所稱，大抵相同。祇班固白虎通德訓稱：「五經者何？易，書，詩，禮，春秋也」。原以漢「樂經」失傳，故有「五經」之說。後漢書通典傳以合論語，孝經稱為「七經」。至李唐褚遂良乃又合三禮三傳與詩書易稱為「九經」。唐與後蜀刻石經，再於九經外加刻孝經論語爾雅，故有「十二經」之名，宋人尊孟，補刻孟子，而傳世之「十三經」以成。

「經名仿自孔子，經學傳自孔門」，皮錫瑞已具言之矣。孔子祖述堯舜，憲彰文武，刪定六經，重整三代遺制，故「經」以得名。比及孔氏門徒，各承其師說傳其一脈，而經學之研究以起，流派滋多，糾紛浸漸。如韓非子云：「孔子之後，儒分為八，有子張氏，子思氏，顏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孫氏，樂正氏之儒」（顯學篇）此輩儒學各有專治。如晉陶潛所云：「顏氏傳詩為諷諭之儒，孟氏傳書為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為恭儉莊之儒，仲良氏傳易為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為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為潔淨精微之儒，諸儒學皆不傳，可考者唯卜子夏」（聖賢羣輔錄）按子夏為魏文侯師，於孔學傳流獨多。故宋洪邁亦云：「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容齋隨筆）是故六經之傳經先秦而至兩漢，若斷若續，各定門戶。西漢尊儒，以秦末博士伏生，叔孫通等舊說，立為十四博士，以提倡儒術。於是有了經今文學。漢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經，博士孔安國以今文讀之，遂又有經古文文學出現。經今古文

學之爭因是肇端。相沿而後，兩漢經學遂翻覆於此波瀾，弗能自拔。五經內之各家，無不有今古文之異見。浸假，今文家以孔子刪定六經，制禮作樂，託古作制，經學傳統歷久未斷。認定孔子乃唯一之哲學家，政治家，教育家。尊信孔子典春秋，斥古文為劉歆偽造。古文家以孔子為史家，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六經皆史，孔子傳周公之舊制，崇信周禮。堅持經學傳統不可考，斥今文為秦火之殘燼，詆諆書為謬妄。舉訟紛紜，莫衷一是。新莽學欲為國師，古文學盛極一時。至光武帝而見廢。東漢鄭玄馬融復倡古文遂又中興。是知經今古文之爭，即為兩漢經學之特色。

由魏晉下迄隋唐，經學風尚轉為義疏。誠如皮錫瑞所指：「夫漢學重在明經，唐學重在疏注。當漢學已往，唐學未來（作者按即魏晉六朝之舊），斷續之處，諸儒倡為義疏之學，有功於後世莫大」（歷學歷史）當魏晉之世漸受東漢鄭何賈誼家之衣鉢，而尙訓詁考據之風。魏王肅雖大捧劉歆，而偽作孔子家語，孔叢子諸書，但古文學終於失勢。王弼注易，何晏集解論語，可謂訓詁風氣之開山。晉杜預作左傳集解，范甯作穀梁集解，郭璞注爾雅，予唐學一大啓迪。北魏孝文，南朝諸生，尊儒崇經，多宗義疏。而經學爭端，亦因佛老之說特盛，化為儒釋道三派思想之融合。隋唐統一中國，仍宗漢學。王通李諤，世稱隋唐儒術復興之鼻祖。而尋章摘句訓詁考證之學，殆由孔穎達，陸德明，賈文彥，顏師古等人之倡導而獲再起。孔賈兩家其於義疏傳經之功，尤獨步百世。至於宋元明三朝，儒術由義疏再變為性理之學。如陸象山云：「六經為我注脚，六經注我，我注六經」。流弊所及，至於竄改經文，即朱熹亦所不免。故皮錫瑞有云：「宋人不信注疏，馴至疑經，疑經不已，遂至改經，刪經。考經文以就已說」。用是經學再有「宋學」，「漢學」之糾纏。清代上繼漢宋兩大變動之後。中承隋唐義疏之風，一以訓詁說經，兼漢之考據唐之義疏而有之。如閻若璩，毛奇齡，惠棟，江永，戴震，王念孫，阮元，孔廣森，孫星衍，皆師承其說。稱為「漢學」。一以義理說經，為王弼何晏，程朱陸王虛玄性理之流沐。如孫奇逢，方苞，全祖望，姚鼐，相率標榜，世稱「宋學」。清末經學岐中生岐。漢宋之爭，外有蘇，徵兩派之分。章實齋力主「六經皆史」之說，予考據訓詁一大打擊。康有為作「新學偽經考」，重整疑古旗鼓。直至近代，仍無定論。翻陳出新，恆窮年累月以從事，疑古辨古

亦汗牛而充棟。然而，歷時愈久遠，枝節益橫生。所謂「經學」之可貴，果在於斯乎？無論國粹與國故，不分保存與整理，經學之「真偽」，祇可依經學內容所顯示之史實與理想，是否合於中國歷史哲學之發展階段以定去取。所謂今古漢宋之爭，於今視之，可以休矣。

三、經學與史學行學

經籍之真價值，蓋在其為原始時期史料，與儒家思想之獨冠九流。史料價值固須考究，而史實所在，非特不因「板木」之聚訟而益顯，反以今古文之爭而無所適從。儒術之可貴，不在辯證，但唐宋義疏既分歧，致孔教真諦，反如歧途亡羊，而蒙蔽無光。此吾人所以主張廢經，絕棄抱殘守缺，冬烘式之膜拜，另闢揚場儒家思想之正經者，意即在此。吾人希望由史學觀點，證明經籍之歷史價值，非如劉歆古文，斷然以「六經皆史」之說，掩蔽一切，更顯依哲學見地，請便六經乃至十三經之儒家文獻，在中國文化思想領域中，獲得正確歸宿。誠如古人所言，儒經實係儒家政教制度文化思想之總匯。十三經中，具體反映先秦時代意識形態之真象者，如莊子云：「詩以道志」，（天下篇），荀子云：「詩者，中聲之所止也」（勸學篇）司馬遷曰：「詩以達意」（史記滑稽列傳），又云：「詩記山川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史記自序）禮記云：「溫柔敦厚，詩教也」（經解篇），楊雄云：「說志者，莫辯乎詩」（法言寡見篇）如此，「詩經」既為古代純文學之散集寫作，亦西周「王政」朝野人士士歌詠之所發。（如孟子云：王者之政息而詩亡）非可視為典範教令者也，明矣。次言及「書」，莊子云：「書以道事」，荀子云：「書者政事之紀也」。大史公曰：「書經紀先王之政，故長於政」。禮記曰：「疏通知遠，書教也」。楊雄曰：「說事者莫辨乎書」。考上古史官既立，左史記事，右史記言，班志云：「三書之書以傳之於世」。孔子採墳與索邱之旨，刪為尙書，所以垂五帝三王之言行以傳之於世。因晉楚之法以魯史為本，尊周公之遺制，志世勢之得失，明尊周攘夷之旨理而作春秋。寓史評於書法，開編年之先河。故莊子曰：「春秋以道名分」，荀子曰：「春秋之微也」，太史公曰：「春秋以道義」，「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禮記曰：「屬詞比事，春秋教也」，揚子曰：「說禮者莫辨乎春秋」。是知尙書

與春秋，記言記事，皆我國上古之史乘。視為經典，不亦謬乎。至於「禮」，「樂」，乃先秦社會生活形態之產品。「三禮」之中，周官代表周代行政制度，故「言周不言禮」。士庶用禮，入於禮記。總之，宗法制度，民生習俗，為三禮之內容。是社會史之一部。與此相輔，庶知先秦時代政治社會之特質。所謂：「禮以道行，樂以發和」（莊子），「廣博易良，恭儉莊敬」（經解），涵養性情，以教人倫，此禮樂之所長，禮淑行爲，樂屬藝術，六藝設教，蓋在「德育」。亦當時社會文化應有之倫理藝術成就。詎可以永絕後昆，徒「沈古不前乎。六經之中，其涉及天文宇宙論者，唯有「易經」。以八元論闡釋古代自然哲學之觀念。所謂：「易以道陰陽」（莊子），「易以神化」（史記），「說天者莫變乎易」（揚子）先民之自然觀如此，孔子以「蕃福三絕」之深研易理而作「易傳」（十翼）遂成天人合一論之「儒化」宇宙觀。魏晉視為「三玄」之一，宜矣。由今視之，其理論能幾於「經」者幾希。

之外，「三傳」列入「經」內，最屬難解。既名曰傳，左氏，公羊，穀梁之說，皆孔子春秋之注脚。如杜預所言：「左邱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業，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意而發，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左傳序）公羊穀梁亦無不如此。三家之傳，如范甯何休等人所指出，雖各有長短，而其爲傳春秋經意之宗旨則一。孔子春秋且無「經」典價值，况三傳乎？「爾雅」原爲解詁經籍之專書，一如近代辭典。屬於「小學」，視之爲經，尤不倫類。雖然，詩，樂之與文學，禮之與社會制度，書，春秋之與史學，爾雅之與小學而外，爲後世尊崇信仰而有亘古不變之價值者，首爲易之宇宙自然，次爲論語孔子之代表儒家學說，再次爲孝經造儒家哲學倫理想行爲規範之極樞。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兩漢之後，歷代帝王，以孝治天下爲儒治之終極。斯乃經籍之精華。而爲中國哲學史上之珍貴資料。然既屬言論思想，四部之中當入於「子」部。稱之爲「經」，亦殊不允當。

總之，十三經中，如依史學而言，則文學史，社會史，政治史，各有依歸。如以思想而言，則易，論，孟，孝四者，蓋即哲學史中必取之根據

。所謂「經」與「經學」之足以號召世人者，捨此又烏可存立乎？

四、「廢經」所以「尊孔」

兩漢以下，「讀牛角式」之板本考據，「冬烘式」之義疏詰詁。「守藏式」之保存國粹名爲尊經，實與孔學之發揚愈趨愈遠。孔子思想未因尊經解經而益顯，反以糾紛錯綜而變質。此孔子之不幸，亦吾人不能主張廢經而藉以尊孔者也。

然則吾人所謂尊孔者何？蓋尊崇其於學術思想之貢獻耳。竊以近代學術之偏激主義者，每詆毀孔子爲封建制度之說教者，動輒以孔子之法古爲守舊，阻撓中國文化之進步。故至倡「打倒孔家店」之謬說。師承儒術者則又標榜「道統」而以今代「韓退之」自居。此皆非中正之論，吾所不取。嘗依史學哲學而論，孔子學說誠我國學術史上之巨星。其眼光之深邃，思想之縝密，決非希臘三哲，德國兩賢（馬克斯黑格爾）所能望其項背。夫自古上至於東周，悠悠千餘載之史蹟，雜然前陳，異說相乘，倘非孔子之整理傳播，使之系統化，更有何人？倘無此偉大之史家，淡泊而趨澹，力圖定傳授，則千載而後，吾國開創時代之政教社會，焉能不絕緒而趨湮沒。司馬遷之史記豈不化爲蕩調。孔子述周公之遺訓，傳五帝三王之典章，歸納諸家雜言，刪繁就簡，其於傳世之功績，誠堪並天地而不朽。其作春秋，創爲體例，爲史家所宗，尤開編年史之紀元。故孔子於史學可謂我國開國第一人。此不可否認者也。吾人尊孔，尊其深功直筆以傳上古興亡絕緒之史蹟，豈偶然乎。

依次，孔子之偉大尤足於哲學體系見之。誠如「中庸」所書，孔子之「思想方法論」，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說，至爲周密。「大學」所示，格物致知爲知識論，誠意正心修身爲道德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爲政治論。由知識而道德政治，是乃樹立儒家哲學之基本體系。立身處世以「恕」爲本，故「我欲仁則仁至矣」。事君爲政以「忠」當先，故尊王攘夷，而「亂臣賊子懼」。敬天法祖，以「孝」是向，故「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綜此三者，歸本於「仁」。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孔子哲學實乃造人的哲學之極致。人非禽獸故須重德性，孔子之「仁」將政治社會一切行爲兼容並蓄，非空言兼愛博愛乃至人本人道主義

迅即開釋張氏，中央始終猶豫不決，即可思過半矣。目前除劉哲，莫德惠，張作相與張雨帥是總角交而外，東北現任在野名流多為小張之部屬。如津沽寓宮王林翰曾為漢卿之祕書長多年，來京說明之馮庸原為東北大學之創辦人，與漢卿亦稱莫逆。他們把東北的保衛希望寄託在張氏之出山殆為不可否認的事實。但誰又能保證張一旦重秉兵權不算舊賬呢？准此，中央實亦有其一再考慮的苦辛在。

由劉哲的談話印證，人物新發表的東北新中央並不盡洽輿情。劉氏稱

政治澄清工作的微妙

從軍紀吏治督察團的結束

談到中國政治的澄清工作

平津軍紀吏治督察團已奉令結束，社會上大多數人士對於該團之結束咸致惋惜。一般人民的觀感，大都對政府機關之撤銷與否從不關心，甚至有些機關在大家的心目中是認為毫無存在之必要，希望其早日撤銷，但獨獨對於督察團之結束却表示惋惜，這就是說明了督察團的工作在社會的評價上是成功的。不過，這種成功究竟對於中國政治的澄清工作能否發生多大的效用？

督察團在結束其最後生命時，各委員在會議室裏完成他們「最後一課」，會後的記者招待會將是督察團成立以來最生動的場面，各委員慷慨陳詞，放了空前絕後的砲。

首先發言的是李嗣堯團長，以冷靜的態度宣讀那張冗長的文告。從過去成立到現在結束，並說明他的工作的經過：「過去該團的組織，是去年七月蔣主席令交監察院開始組織，原令上說因為平津為華北局勢之樞紐，軍政配合最關重要，

：「我對那幾位主席都很贊同，不過在四位將軍來京後再發表一定更好」。無論如何，中央在東北軍政一再的失脚，確給予東北人士一口實。東北人士一致強調建立地方武力，使張學良與其舊部獲得良好的抬頭機會。東北人士在中央的策應與地方的要求使中央緊握東北人爭政權的策略不能不暫予「從緩」。這是水利渠成的時候了。理由是假設東北再由中央之手而全盤失敗，中央將無法應付東北人士的未來譴責。而且，更將增加反中央勢力的擴張。這筆賬中央打得機巧而清楚。

·雲·

嚴懲貪污，整飭軍紀更為關鍵所在，所以主席飭院組辦，寄以莫大之希望。成立以來，五月有餘，共收來文總數三千另二十四件，內書狀告密二千三百七十七件，其中比較重要派員查辦者三百另二件，比較次要函行各機關查辦者九百六十件，存在者一千另八十四件，移送軍政司法各機關偵查法辦者三十八件，此移送法辦之三十八件即三十八案。其未結各案，已經通知各機關移交監察使署繼續辦理。就其組織及職權上說，則本團屬於監察院，實即在地方監察職權之擴大，乃根據法制上產生之機構。先辦後報，與指揮軍警憲協助辦案，種種便利及節省時間，與公文往返轉輾需時，說與監察之普通糾舉彈劾，有疾徐繁簡之不同。究之不出監察之範圍與監察權之擴大行使。其審判仍歸軍民司法機關依法辦理。於審判權之獨立無涉，與監察權之行使亦不相背馳。所謂機關之督嚴，是尊嚴其機關，而人之個

人行為不與焉。人與機關是兩件事。人不能保其不為非法，則監察制度補偏救弊，所以有其必要，國父說過，裁判人民的機關已經獨立，裁判官吏的機關亦應獨立。此即由彈劾糾舉至最後之行政處分之懲戒權，歸監察院職掌，若監察院有懲戒權，方可貫徹監察權之行使與監察權之效能。亦即與督察團之職權，能指揮軍警憲辦理案件，移送軍民司法機關偵查法辦者，有同一之作用。現在本團已奉令結束，雖未圓滿達成澄清吏治之使命，然從此一番振作，奸貪不法之徒心目中亦必有所警惕，在此以後當不敢肆無忌憚，再存僥倖之心理，本團同人……但求內不疚於神明，外無慚於清議。——

李團長一席話，表明了督察團「內不疚於神明，外無慚於清議」的耿耿之心。

繼由劉琦章委員激昂陳詞，他說：「督察團結束是不是平津冀軍紀吏治已經好了呢？不，我

們不作如是想，相信一般人民也不作如是想。我們只能說督察團已使不法者心目中知所警惕。有人說督察團之成立有損政府威信，這話很難說，我想不意貪污才真有損政府威信呢！也有人認爲督察團辦案有損司法尊嚴，但他不明白司法尊嚴正需要司法界本身來維護的真理。我們自信沒一件事有損政府威信及司法尊嚴之處，而不能十分盡到收拾人心的責任，倒使我們感到最大遺憾。譬如：我們大家知道的三十八件要案如范崇毅案，盧清濟案，陳嗣哲案，周奉璋案，這些案子送到軍法司法機關去，到今天差不多都沒有判決。我們對此非常抱歉。俗云：道高三尺，魔高一丈。劉氏提出更警惕的是：「督察團結束了，而貪污者的技術却進步了」。

時子周委員獨具見地，認爲督察團結束後，繼承懲治貪污職權的是新聞記者，他說：「貪污怕法律，但更怕輿論，督察團結束後，法律部份移交監察使署，而輿論部份就交待給各位新聞記者了」。

各委員發言，真率坦白，雖然明天就不是「打虎英雄」了，而今天仍然保持無畏精神。

在今天督察團結束之後，我們一方面對於主持者李嗣德氏固深願其能以辦理督察團的精神來加強發揮其監察使的職權，同時更希望政府當局對於今後監察機關爲何不能行使職權，克盡責任之原因，加以研討，盡力改善，則督察團雖已撤銷，其效用依然可以存在。如果說非有督察團這樣的組織無法發生整飭軍紀吏治的力量，則經常設立的監察機關之應否存在便不免大成問題。再如果說督察團撤銷之後，貪官污吏有如「警報解

除」，又將大肆活躍，那麼不僅督察團以往的辛勞等於虛擲，而政治的澄清亦終將無望。

以督察團的組織來求達到刷新政治的目的，這實在是一種極可憐的想法。今天中國政府機關貪污案件之層出不窮。根因所在，一是風氣敗壞，一是生活困難。前者屬於精神方面，必須從在上者率先倡導以期其挽回，後者屬於物質方面，必須有根本辦法使能養廉而不致羣趨貪濫。如果不能從這些地方着眼，徒然欲恃清查督察等類臨時機構便以爲可以絕滅根株，這實在太難令人相信，也可以說是太離奇不可信；而且所謂清查，督察，由於人事的關係，每每不能澈底執行，甚至對某種特殊人物根本全失却效用，於是遂有所謂「專捕蒼蠅，不打老虎」之諷嘲。以往此種事例甚多，即此次督察團雖大有「逢龍折角，遇虎拔牙」的作風，然而內心中心恐仍不免有若干苦悶，無由向外宣訴，也許是顯中應有之義。那末像這樣來日方長，貪污未盡，政府究將何以善其後，如何來謀根本防止肅清之道，似乎不能不有一個確實有效的辦法拿出來。

有人認爲目前中國的貪官污吏等於窮人身上所生的蠱子，督察團的效力最多不過是從衣袋中提出幾個蠱子置之死地。而判處叢生滋長無法撲滅，假若不能重換衣裳，洗滌沐浴，則捉蠱者雖不斷努力，依然無法肅清。這一個比喻，我們覺得相當確切，我們願意提起政府的注意。而能否重換衣裳，洗滌沐浴，便是要政府當局拿出決心的辦法。

讀史劄記

外戚恩澤之封(上)

· 訥菴 ·

外戚封侯，始於漢景帝時，帝欲封皇后之兄王信爲侯，爲丞相周亞夫諫阻是也，亞夫既死，而王信遂封蓋侯，於是齊嬰以太后之姪封魏其侯，田蚡以皇后異父弟封武安侯，田勝封周陽侯，後乃無不封矣，景帝王皇后之母，已嫁二夫，王田兩氏子，皆其子也，（漢時婦再適，無足怪，予另有記）此姪信祀神君，見於史記封禪書，「神君者，長陵女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集解，「平原君姓王氏，武帝之外祖母也……異姓婦人以恩澤封者曰君」。武帝時，齊嬰田蚡相繼爲丞相，外戚專朝政自此始。逮西漢末，王氏五侯，驕盛已極。劉向封事極諫，外家宜加裁抑，語切直，不省，而新莽卒以篡漢，外戚擅權，害乃至此。至於霍光以女爲漢宣帝后，而光先爲大將軍，總百揆，貴顯已久。曹掾亦曾以女爲漢獻帝后，（伏后被殺後，以曹貴人爲后），然父則欲效周文，（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矣，見通鑑）子則徑法舜禹，皆與外戚無涉也。按漢法非功不侯，亞夫持論甚正，自景帝破壞家法，（按齊嬰尙以監破七國軍得封，與其僅以戚顯者略異）武帝乃取平陽驛者衛子夫，入宮寵幸，至廢陳皇后而立之。（陳后爲帝姑大長公主女，即武帝幼時顯以金屋貯阿嬌者也）帝欲尊顯衛青，青爲子夫弟，其來微矣，以椒房之戚，軍功起家，爲大將軍，然邊釁屢開，國用大耗，輪臺之悔，且已無及。及成帝以飛燕爲后，禍水滅火，（淳方成語）詭謀不滅，尙復誰咎哉！

中國歷史上之財務行政

· 杜 衡 ·

中國政治制度史談之四

中國歷史上關於財政的看法，不外一句話，曰取於民有制。向民間徵收賦稅，總是越輕越好，至於用度是足與不足，人民是否得益處，就沒有人間了。因為中國是量入為出的財政，錢多則多作事，錢少則少作事，或不作事。不作事也沒有什麼不可，人民何必要政府替他作事呢？只要不擾就很好了。就是生命財產受天災流行與四夷交侵之害，也自有死裏求生的方法，不致於怨政府不為之預防，不為之救濟。所以在中國人民傳統的思想上，最好是少要錢的政府，而且簡直希望政府不要問人民的事。在事實上，漢代所以承秦之敝而更奉其職，人安其業，享四百年之國祚，為秦以後最悠久之統一治平時代，就是因為漢初的君相識得這個訣竅，籠絡住了人民心理之故。

在後世能不要政府麼？當然是不行的。但是政府要替人民增進幸福，必須先有充裕而平均合理的賦稅制度，而人民肯出這筆賦稅，又必須先有收支公開廉平切實的保障，因為中國向來不是量出為入的，而且徵稅從不徵求人民同意的，所以財政不能受人民的監督，自然沒有收支公開廉平切實的保障，人民何必希望政府，何敢倚賴政府，何心過問政府的事呢？

民主政治在中國未曾成功，而且前途還是遼遠，就是因為對於政治興味之缺乏。而政治興味之所以缺乏，還不是興味的問題，又因為財政之未上軌道，賦稅之不公平，收稅人員之上下其手，使人民感覺消極厭惡與不合作。在地方政區一篇中，已經闡述到這一點了。

我們先要研究古代國家大宗支出是什麼？經常方面不外以下兩項：一是皇室關於典禮的用品，一是官吏及一切公職人員的俸祿。這些都由地方人民以實物繳納，用人力輸送中央，這就是漕運。再在其間期的各處需要的情形，將這些實物隨時發換，使之供求相應，這就是均輸平準。換言之就是國營商業，在西漢及北宋都會經試行。有了這兩種基本方法，中央便可以把握經濟實權，應付這一點經常的支出，是很簡單容易不成問題的。關於平準一項，每不容易得着正確的了解。今引史文兩段如下：

桑弘羊以諸官（政府各種工業）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實物繳納）或不償其價費。（運費）乃請置大農部承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任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而許之。一歲中諸均輸出五百餘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是後人攻擊的口實，以為增加出來的財物那有不是出之於民的呢？但是所謂不益賦，是不直接增加於民而取之於不正當的贏利分子，於民生自然是有利的，也是統籌全國經濟財政所必采的政策。所以熙甯中制置三司條例司說：

今天下賦財內外不相知，盈虛不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常數，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贏，年儉物貴難以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徙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發運使實總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禁酒稅為事，軍儲國用多所仰

給，宜做以錢貨，資其用度，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雜買稅做上供之物皆得徒費賤，用近易逃。……

這件事彙弘羊創之於前，劉晏行之於中，王安石主之於後，都是確有見地與經驗的政治經濟家，而卒不能得一般人之諒解。原因在什麼地方呢？根本問題是中國人民情願出少數的賦稅，其餘的事願意政府不加過問，違反這個原則，就發生反響，發生反響也就辦不好了。因為凡是一種政策如不能得多數人的誠意擁護，就必至落在少數人手裏，而這少數人利用多數人之不合作，就必至作奸犯科營私舞弊而事業不能成功。所以不難創行新稅而難於使稅政清明。

漢代之取民，本來極輕微的。田租是三十取一，丁稅是每口出粟這是公的，至於錢每年一百二十錢，可是另外有徭役的負擔，自己不去的也要替人出錢，皇室私的經費則取之於少府及水衡的雜收入。這種特別經費的收支情形，是不須公開的。因為周禮上有一句話，叫作惟王不會，這大概也是傳統觀念。

但是政府如何能沒有特別的用途呢？比如對匈奴的戰事，防河的工程，靠經常收入，一定是不發的，就不能不另外想法子了。所謂另外的法子，就是如漢書食貨志所舉的，或是獎厲特別獻納，或是施行特別專賣稅，而尤以貨幣政策的運用為其主要歸宿。實言之就是增發貨幣，也就是間接增加人民負擔。

漢代如此，後代何莫不然？其實國家支出只要用在正當的用途，總可以間接有益於人，而不是白費的，而且只要不歸中飽濫用，這財富不藏於民即藏於國庫，都是一樣。武帝那樣手筆闊大，其結果究竟增加了人民的富力，而國庫甚形充實，看王莽滅亡時庫存金縢那樣雄厚，就可想見。真正要不中飽濫用，就是不增加人民負擔依然可以應付很多的用途。反之則無論如何增加，於國於民仍是兩無裨益。通考有左列一段論證極為精當：

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考之史傳，未見其有以爲富國之術也。周之時酒有推，鹽池鹽井有禁，入市有稅，至開皇三年並罷之，則賦稅而已。然開皇三年調絹一匹者減爲二丈，役丁十二番者減爲三十日，則行蘇威之言也。九年以江表初平，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稅十年，以宇內無事，益寬舊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放，十二年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其於賦稅復闕略如此。然文帝受禪之初，即營新都徙居之，繼平陳，又繼討江南嶺放，十二年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其於賦稅復闕略如此。

旋因行慶賞，頒給布帛三百餘萬段，則又未嘗高於用財也。表既非苛賦賦以取財，且時有征役以廢財，而賞賜有功並無所愛，平陳凱而何以數富如此？史求其說而不得，則以爲帝躬履儉約，六宮服澣澣之衣，乘輿供仰有故廠者隨令補用，非燕享不過一肉，有司嘗以布袋貯乾薑，正規之稅雖然取得非常之輕，然經不住層層的中飽剝削，暗中加重，所以收稅方法始終不能恰當，不得已只有執簡絮繁化零爲整稍爲可救一時之弊。唐楊炎創兩稅法，合租庸調爲一，而分春秋兩季徵收，故謂之兩稅。租者地租，庸者力役，調者丁稅，所謂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家則有調，現在是一概不問，「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考其動機，就是因爲「賦斂之司數四，莫相統攝，綱目大壞，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權臣巧吏，因得旁緣公私進獻，私爲贓盜，王賦所入無幾，科斂凡數百名，（名是名目）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吏因其苛，蠶食於人。」改制之後，果然更不能容容。及至明萬曆中，又因爲名目繁多，將所有的直接稅都併在田賦以內，謂之一條鞭法，據說是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一歲之役官爲倉募行，力差則計其工食之費量爲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費加以贈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併爲一條，省計敵徵銀折辦於官，立法頗爲簡便。照此看來，都足見以前徵收方法是不盡善，所以才

不能改良。

但遇有非常之事，正規田賦總是不足用的，於是仍取之於民，隨事立名，等於加賦。宋末有經制錢，明末有三大餉，（遼餉、餉練餉）時論都不以為然。三餉之加，或者竟指為明亡之原因。清代有鑒於此，申明永不加賦之說，以收人心。手段是比前代高明了。然而要知道國家正供取民本不算多，病在地方官吏差役之格外橫征需索，以及紳富之隱匿逃避，單是不加賦人民並不感激，何況到了末年，賠款重重，新政繁興，各種捐層見疊出，那一樣不根據地畝？那一樣不是農民的負擔？地畝的附加稅在地方中最為直截了當，自民國以來，還是常常在這上面打主意，銀兩折合銀圓，已經無形加重，幾種附加稅合起來，竟有比田賦正額還多的，又有由地方政府預借預征的，這筆賬永遠算不清的了。

事實上這一點輕微的田賦也並不會全為政府所得。就如江蘇的松江府屬，算是田賦最重的了。據日知錄說：

……洪武以來，一府稅糧共一百二十餘萬石，租既太重，民不能堪。於是皇上憐民困，屢降德音，將天下保官田地額遞減三分之二外，松江一府稅糧尚不下一百二十萬九千餘石。愚歷觀往古，自有田稅以來，未有若是之重者也。以農蠶夫婦凍而織餒而耕，供稅不足則賣兒鬻女，又不足，然後不得已而逃，以至田地荒蕪，錢糧年年拖欠。……

今按宣朝實錄，洪熙元年閏七月，廣西布政使周幹自蘇常嘉湖等府巡視還言，蘇州等處人民多有逃亡者，詢之耆老，皆云由官府弊政困民所致。如吳江崑山民田畝舊稅五升，小民佃種富室田，畝出私租一石，後因沒入官，依私租減二斗，是十分而取八也。撥賜公侯駙馬等項田每畝舊輸租一石，後因事故還官，又如私租例盡取之。且十分而取其八，民猶不堪，况盡取之乎。盡取則無以給私家，而必至凍餒，欲不逃亡，不可得矣。

這樣看來，重稅徒有其名，也並不能全數入官。考之於清史稿食貨志，乾隆初年江南已欠賦二百餘萬，嘉慶初年各省積欠至二千餘萬。據順治初年戶部奏云，賦稅虧額如此，財既不在國，又不在民，大率為貪官墨吏所侵蝕。約而言之，其弊有五，一曰報荒不實，二曰報災不確，三曰捏作完欠，四曰徵存不解，五曰交代宕延，覈計近年賦稅短徵，以安徽及江蘇之江甯為最，蘇州江西次之，河南又次之，多者所收不及五分，少者亦虧一二分不等。這篇話可謂洞達權結之實。惟有從事實上體察，方寸發見。不似一味以輕徭薄賦為政體者，徒然皮相而已。

最要緊的發見，就是中國歷代政府還沒有利用其民取之無藝的程度。而上與政府為難，下與百姓為敵的，就是官員吏役以至地方紳士。人民膏血到這班人身上去了。不過話要說回來，這班人也未嘗不是人民一分子，他們果真有飯吃，大家也可以開接受其益。真正吃虧的還是極良儒無能的人，他們雖想反抗，也無從反抗。就是反抗而換一班人來也無非如此，未必能使良民得着好處。中國的政治就在這種相忍為國的原則下支持過去。

自漢代已經知道單靠田賦是不行的，大宗收入為後世所遵行不改的，就是鹽稅。鹽之為物，在出產地不值錢，而其價值全在裝運之費，離去產地越遠，則裝運費越高，而人民受威脅更甚。所以政府是有權控制，不使這種不合理的厚利落於商人之手，而鹽法興焉。其實人生日用必需之物，都因時因地而價值長落不齊，何嘗不都可由政府管制支配，利歸公家而人民常可得廉價之物，不過習慣已成，不願改造罷了。唐代遵行漢的鹽鐵法，以涇州揚州為起運散放的中心，以此籠盡東南的財富，供給中央的軍政費，在國家財政上是一重大的進步。憑仗這一點，方能使河北山東的強藩悍將到底不能為所欲為。而長江流域日漸繁榮發展，以進至珠江流域，縱使將河北山東盡數失去，猶足以立國。讀到劉晏韓滉諸人的傳，方才知道唐代的國庫是有眼光的，不僅為一時計，而且是後世所永遠利賴。經濟政策之關係國家安危有如此者。

繳稅後來不知道怎樣了，鹽稅却始終是重要收入。但是到了清乾嘉以後，兩淮產鹽最多的地方，世襲鹽商窟穴其中，倚爲世業，花費太重，剝削太多，應銷之引，積欠纍纍，不易清償，爲國課大受影響，勢不能有改革之法。當運商認引最盛之時，鹽衣足食，窮奢極欲，揚州淮安等處，成爲全國物質生活最優裕的地方，甚且還能有裨於文化事業。陶澍任兩江總督，始訂淮北票鹽之法，領票即可運鹽，聽其自相競爭，而將鹽院及運商積弊盡行除去，當時甚遭人言讒毀，但是成效卓著，也不能不承認。洪楊亂後，會國藩又將淮南也改票鹽，各省也陸續整頓，鹽稅遂大見興盛。清末設鹽政院，已經預備大有興革，及民國二年善後大借款成立，指定以鹽稅作抵，由外人代爲協助鹽務行政，果然又大有成效。後來幾年北京政府的政費簡直全指鹽稅接濟的。

關稅本來在古代不甚重要地位，自海通以後，中外貿易日盛，海關遂成田賦以外最大宗之收入來源。雖然關稅不能自主，並且抵充賠款，而自從外人代管關稅以後，有助於國家財政也不少。別的稅收不免爲剝奪地方的軍閥所把持劫奪，而關鹽兩稅却從沒有破壞行政系統。平心而論，外人干預我們的財政是不能忍受的。但是用客卿來替我們設計，替我們管理，只要人民相安，國家有利，何嘗不是一種辦法？光緒年中總稅務司赫德曾有整理全國田賦條陳，據他的估計，一經整理，可以增加很多的歲入，興辦很大的事業，而人民毫不額外增加負擔。他在中國久了，對於中國內政各種實際狀況都很瞭然，他深知田賦的弊病太大，只要肯用科學方法改良，一定可以發揮無窮的效率。果真能將田賦與鹽關兩稅一同改良進步，則判現在必已辦成很多事業，而不必另外搜括了。

田賦之整理，應以土地清丈戶籍調查爲入手方法。這不但是財政基本政策，也是政治踏入正軌之必具條件。古來的人未嘗不明白這個道理。宋仁宗時有一個郭詒，就提出這個問題。其本傳說洛州肥鄉田賦不平，詒攝令以千步方田法四出量括，遂得其數，除無地之租者四百家，正無租之地者百家，收通賦八十萬。熙甯新法中方田法就是最富於建設性的一種。其法大概（一）先定土地面積的單位，（二）政府派人實行視察分別土地肥瘠之等級，（三）以所定的單位及所定的等級造成表冊，以爲徵稅的張本。至於徵稅，則規定租額不得升奇爲整，致超定數，且確定免稅之地。宋史食貨志說：

神宗忠田賦不均，熙甯五年，重修定方田法，詔司農以均稅條約并式頒之天下。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地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澆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爲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爲限，舊嘗收鹽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爲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爲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有禁。若瘠而不毛及棄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方田之角，立土爲界，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烟折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給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爲正。

這實在是七地行政之良好規模。據蔡京說：自開阡陌使民得以田私相貿易，富者恃其有餘，厚立價以規利，貧者迫於不足，薄移稅以速售，而天下之賦調不平等矣。神宗講究方田利害，作法而推行之，方爲之帳而步畝高下丈尺不可隱，戶給之帖而升合尺寸無所遺。以買賣則民不能容其巧，以推收則吏不能措其姦。但是又據說：方田之官僅於跋履，並不躬親行糧拍案，驗定土色，一付之胥吏。致御史台受訴有二百餘畝方爲二十畝者，有二頃九十六畝方爲十七畝者，虔之瑞金縣是也。有租稅十有三錢而增至二貫二百者，有租稅二十七錢而增至一貫四百五十者，虔之會昌縣是也。（都是宋史語）照此看來，病在奉行之不力，仍是有名無實。良法美意到了庸劣的官僚手裏，又利未見而害已生了。

明初定制以黃冊定戶籍，以魚鱗冊經土田，似乎也很扼要。無如仍是犯同樣的毛病，事實上冊籍並未正確，虛有其名，於是弄得窮人有稅而無

田富人而有田無稅。無稅之田不是責甲賄債，便是向窮民攤徵，而國課也大受影響。乃至墾田和歲入的數目越來越減少。到了張居正當國，不得不令天下田畝通行丈量，限以三年畢事，號稱豪猾不得欺隱，甲里免賠累，小民無虛糧，一條鞭之法所由興起，究其實還是澈底的補偏救弊而已。

田賦之積弊，又影響到土地之集中於豪富，使富者益富，貧者益貧，耕者不能自有其田而有田者坐享其利。宋史食貨志稱：紹興六年知平江府章誼言，民所甚苦者催科無法，稅役不均，強宗巨室，阡陌相望，而多無稅之田，使下戶爲之破產。又通判安豐軍王時昇言，淮南土皆膏腴，然地未盡闢，民不加多者，緣豪強虛占良田而無徧耕之力，流民糧負而至而無開耕之地。諸如此類的話很多，到了末年，賈似道行公用政策，就是有益於豪富占田的利益，應當由府收過來。他用錢來收買，算是很溫和的辦法。但是富人有士大夫階級爲喉舌，就大肆攻擊了。他同時力主經界政策，也無非整理土地的經常方法，也爲了一班袖手旁觀的人所齒冷，發出輕薄的諷刺，說什麼「縱使一坵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賈似道爲人雖無其足取，然而能看江南土地制度之應整頓，眼光是不錯的。

中古以後，徵稅方法比較可以改良的地方，就是用士人任收稅官吏。唐劉晏以理財負盛名，他的成功原因之一就在此。不過也有一個條件，就是俸給要優厚，使他們能以養家，而不必舞弊。否則仍是不行。清代洪楊之亂，曾國藩胡林翼以個人倡導的精神來治軍，政府並不能供給其所需之軍費。他們看出貨物通行稅是一種利源，爲以前所未曾注意。而且商貨之流通是與軍事政治相表裏的，政府力量能保障商貨之安全，商人自然願意納稅以供軍用。又因爲商貨得以流通，增加民生之安定，促進地方之繁榮，自然減少亂源，而大局可以漸平。所以在他們手裏，制定釐金章程，尤其在湖北湖南二省，實行起來最爲利多弊少。他們的辦法，也是用劉晏遺意，選擇紳士，優給薪金，官廳不過在上面監督其大體，不使官吏插手。其成效是有目共睹的。他們在政治上的成功，可以說很有賴於此。但是後來不能嚴格執行，漸失初意，薪金仍是微薄，而用人仍是徇情，而厘金之弊又起。

統觀前後，徵稅方法不合理，是財政不上軌道的總因。也就是政治制度的一大缺點。還有監督用途的一方面，比如預算及審計制度，在過去也都忽略了。然而在過去的全盤政治制度中，因爲政府收入支出都是寥寥可數的幾大宗，縱使缺乏監督方法，爲害還不甚大。就在現行政治制度中，與其過於重視形式上的監督，還不如集中全力於稅法之尤爲扼要。其他瑣屑，更不必一一費詞了。

注：鹽政之弊，近人呂思勉白話史說得甚爲透闢。其言曰：「清代的鹽，由戶部發引，商人納銀於運庫或道庫，然後領引行鹽，引地各有一定商人亦均世襲，就變成一種商專賣的樣子。——這種引謂之正引，有時引多商少，則另設票售之於民，謂之票引。票引是沒有地畧的，然後發行的，所以引數和一地方需鹽之數大略相當。到後來戶口多了，鹽便不够銷，——或因特別事故，戶口銳減，則又不能銷。(一)什麼地方吃什麼鹽，初時也是根據運輸的狀況定的，後來交通的情形變了，而引路依然，運輸上也不便利。(二)因鹽不够銷之故，商人借官引爲護符，夾帶私鹽，銷起來，總要先私而後公，於是官鹽滯銷而國課受其影響。(三)而且商人的得鹽有種種費用，成本比私鹽爲重，運輸又不及私販的便利，所以就商人夾帶的鹽也敵不過私販的鹽，何況官鹽。(四)而且商人的得鹽既有利可圖，就做了無賴棍徒的巢窟，於產鹽和隣近產鹽地方的治安大有妨害。(五)私販既有利可圖，就做了無賴棍徒的巢窟，其結果反弄得巡緝之徒也擾害起人民來。(六)保護一部份人專利，使人民都貧貴鹽。……」

金城銀行

總行：（上海江西路二〇〇號）

辦理商業銀行
一切業務兼營
儲蓄信託業務

電話：（一二四〇〇）

浙江實業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兼營儲蓄信託國外匯兌

總行：上海福州路一二三號

電話：一八〇五〇

分行：上海虹口 杭州 漢口

團體分紅儲蓄

每戶十五萬元 分十戶萬元

甲種 有六次獨得紅利
壹萬萬元
及四十八個一仟萬元之機會

！多會機 ！銀利紅 ！短限期
機良失勿·富致蓄儲
儲存可均行銀理代大各
局託信央中

號九四二七一：路城 號二路環天海上，址華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兼辦儲蓄信託外匯倉庫

總行：上海甯波路五〇號 電話一二五六〇

本埠分行：南京西路 林森中路 愚園路 八仙橋 虹口
提籃橋 徐家匯

外埠分支行處：重慶 成都 蕪縣 蕪湖 蕪陽 昆明 西安
寶雞 長沙 南昌 漢口 武昌 蕪湖
南京 鎮江 常州 無錫 蘇州 香港
廣州 北平 天津 青島 濟南 蚌埠